

# 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 30 年(上)<sup>\*</sup>

张文宏

---

**内容提要** 近 30 年来,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领域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研究方法来看包括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在定量研究中,主要的测量工具是提名法和定位法。从研究领域来看包括社会地位获得、社会支持、阶级阶层与职业流动等。从研究特征来看主要有: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理论模型和统计技术被应用到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目前正在走向专业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出版了多部社会资本的教材、专著、论文集和译著;在经验研究中,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被结合起来。从研究领域的未来趋势来看:“关系社会学”将成为新的学科增长点;社会网络分析与阶级阶层分析将融合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互联网及其他现代通讯工具中的社会资本特征、构成模式与人际社会网络形成互动;社会资本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整合与协调手段;风险与全球化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资本结构与功能发生变迁。

**关键词** 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 关系社会学 定量研究 问卷调查

---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已经走过了 30 年的历程。本文试图梳理社会学重建 30 年以来中国社会学者在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理论和经验成果,并从研究方法与大型问卷调查、研究领域、主要特征和未来趋势等几个方面对该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行评述。

## 大型问卷调查和研究方法

### (一) 大型问卷调查项目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理论与经验研究的综合体,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在国内社会学界的兴起,与一批美国知名社会学家的热心推动密切

相关,其中时任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社会学系主任的林南教授在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的引进与推广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20 世纪 80 年代,林南教授首先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大学等第一批最早恢复或重建社会学系的高等院校讲授社会网络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而吸引了一批国内的追随者。80 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社会学家通过与国内社会学者的合作研究项目,将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运用到大规模问卷调查项目中。

在中国大陆开展的第一项涉及社会网络主题的调查项目是 1985 年林南主持的“天津城市居民生活状况与心理健康调查”,随后由布劳(Peter

---

\* 本文的梳理范围主要包括以中文发表的有关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同时涉及部分外籍华裔社会学者关于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的英文成果。限于本人的知识背景和篇幅限制,本文的梳理没有涉及管理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本文的写作参考了笔者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学年鉴 1999 ~ 2002》、《中国社会学年鉴 2003 ~ 2006》上的关于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评述的几篇论文。感谢“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组织研究中心”、“上海市领军人才计划”、“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上海高校社会学 E - 研究院”的基金项目对本研究的支持。

Blau)、魏昂德( Andrew Walder) 和阮丹青主持了 1986 年在天津进行的“天津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状况”的调查( 阮丹青等, 1990)。之后, 边燕杰主持了“1988 年天津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调查”( Bian, 1994)、阮丹青主持了“1993 年天津城市居民生活与社会网络调查”, 张文宏主持了“1998 年天津城乡居民社会网络调查”, 边燕杰、戴慧思( Deborah Davis) 和王绍光联合主持了“1998 年中国四城市餐饮网与社会资本调查”, 边燕杰主持了“1999 年中国五城市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调查”, 赵延东主持了“2001 年武汉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社会网络”调查等。

如果说 20 世纪 80~90 年代在中国大陆实施的以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为主题的大型问卷调查多数局限于单一城市或几个城市的话, 那么进入 21 世纪以来, 在全国性的大型调查项目中,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主题开始作为核心内容或核心板块进入研究人员的视野。如由中国人民大学李路路和香港科技大学边燕杰共同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2003 年和 2008 年调查的主题均为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 2009);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主持的“中国社会状况调查”、边燕杰主持的“中国 8 城市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调查”、北京大学邱泽奇主持的“中国家庭跟踪调查”(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2009; 2010) 等, 都有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专题或板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调查项目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二) 研究方法和测量技术

从已经发表的成果来看, 在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领域, 使用量化方法的占多数。而在量化研究中, 又分为个体中心网络和整体网络的研究方法。

在使用个体中心网络的调查设计中, 又有提名法( Name Generator) 和定位法( Position Generator) 之分。个体中心网络的题器设计, 首先运用于 1986 年的“天津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调查中, 主要采用了美国社会学家博特( Burt) 和马斯丹( Marsden) 主持设计的“重要问题的讨论网”的

提名法( Burt, 1984; Marsden, 1987)。此后, 1993 年的“天津城市居民生活与社会网络调查”、1998 年的“天津城乡居民社会网络调查”、李沛良主持的“2000 年香港和北京社会支持网络与心理健康”等调查均采用了经过修改的“重要问题讨论网”及范·德·普尔的“社会支持网”提名法( Ru-an, 1998; 张文宏等, 1999; 张文宏、阮丹青, 1999; Lee 等, 2001), 其中社会支持网又进一步划分为工具性支持网、情感性支持网和社会交往网络。提名法的优势包括: (1) 相对于调查中的行动如提名项目而言, 可以确定特定的内容区域; (2) 描绘自我中心网络的位置、特征及嵌入在自我网络中的社会资源。但是, 提名法测量的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 (1) 缺乏抽样提名项目的架构; (2) 偏向于包含较强的关系( Lin, 1999)。

在国内的研究成果中, 最早使用定位法来测量社会资本始于 1998 年边燕杰等主持的天津、武汉、上海和深圳四城市的“餐饮网与社会资本”的研究( 边燕杰、李煜, 2000)。其后, 边燕杰主持的 1999 年中国五城市( 上海、天津、广州、厦门、长春) “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调查”、2003 年和 2008 年 CGSS 均采用了边燕杰提出的用定位法测量拜年网所嵌入的社会资本。定位法是林南先生在 1981 年的奥本尼研究中首先提出的( Lin, Ensel, and Vaughn, 1981), 目前已经被普遍地应用于中国社交网络与社会资本的调查实践中。与提名法相比, 定位法具有几个优势: (1) 它建立在一个既定社会中有意义的代表性地位样本的基础上; (2) 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识别与这些资源位置的联系; (3) 以多种资源标准( 例如职业、权威和产业) 为基础( Lin, 1999)。

在社会网络的研究中, 还有部分学者使用了整体网的研究方法, 主要使用 UCINET 分析小群体诸如乡村、经济组织或教育组织内部的关系。如罗家德( 2005) 关于公司内团队网络结构与公司绩效沟通网络、虚拟社会网与现实社会网及咨询网络和情感网络的研究, 刘军( 2006) 关于北方农村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等。同个体中心网络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概率抽样和统计推断相比, 整体网研究的样本较小, 一般是在一个小群体内部整

群抽样,不适合进行研究结论的推广。笔者将整体网方法比喻为“定量研究的个案方法”。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使用社会网络或关系的概念,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了农民工聚居区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王春光,2000;刘林平,2001)、农民工的地域与职业流动中社会信任关系的变化(翟学伟,2003)、商业交易中的信任机制(罗家德、叶勇勋,2006)等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受访者推动抽样(RDS)开始运用于国内的大规模问卷调查中(赵延东、Petersen,2007;张文宏、雷开春,2008)。该方法是在传统“滚雪球抽样”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使研究者有可能根据样本对总体特征做出合理的推论,特别适合于研究规模和边界不太清楚、不愿意暴露身份的隐藏人口,如下岗和失业职工、无家可归者、新移民等。

### 理论研究和经验发现

#### (一) 理论研究

不可否认,随着一系列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领域的经典文献被翻译成中文发表,相当一部分国内青年社会学者开始追踪国外前沿成果。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以评述性地介绍西方著名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学者的理论为主。另外,通过系统评介西方社会学家的有关理论和实证发现,结合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范式在研究中国社会中取得的成果而加以提炼,形成新的命题和假设,并对经验研究中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边燕杰(1999)通过对西方社会学家关于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的经典研究成果的系统评述,对于网络结构观、弱关系强度命题、强关系命题、社会资源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结构洞理论及其经验发现做出了精炼的概括,由此提出的制度安排假设、市场化假设和劳动力供给效应假设为后来的“职业流动中社会网络的功效”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思路。笔者通过对社会网络分析在西方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基本原则、主要理论、研究方法及其经典的实证研究的系统梳理,指出对于一个“关系资源”极为丰富的华人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分析方法可以提供独特的视角和实证研

究手段。其他一些学者则在经济社会学或新经济社会学的教科书中对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做出了扼要的介绍(朱国宏,1999;张其仔,2001)。

对社会资本理论建构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林南(Lin,1999,2001)。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的,它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因此,“社会资本可被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涉取或动员的资源”。按照这一定义,社会资本的概念包括三种要素: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涉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通过有目的行动中的个人运用或动员这些社会资源。因此可以构想,社会资本包含的三种要素涉及结构和行动:结构的(嵌入性),机会的(可涉取性)和行动导向的(运用)。林南(1999,2001)认为社会资本的理论模型应该包括三个过程:社会资本中的投资、社会资本的涉取和动员、社会资本的回报。他把社会行动分为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工具性行动被理解为获得不为行动者拥有的资源,而情感性行动被理解为维持已被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对工具性行动而言,可以确认三种可能的回报:经济回报、政治回报和社会回报。每一种回报都可被视作增加的资本。对情感性行动来说,社会资本是巩固资源和防止可能的资源损失的一种工具,原则上是接近和动员享有利益和控制类似资源的其他人。因此为了保存现有资源,可以储存和共享嵌入性资源。情感性回报包括三个方面: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另外,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的回报通常是彼此增强的。

林南(2001)探讨了社会资本的三个范式:社会网络、民间参与和普遍信任,指出社会资本的理论发展应以网络和其嵌入资源为基础,以个人与人际关系的联系这一中观层次为分析取向。民间参与和普遍信任是网络和嵌入资源的派生概念,其在理论和实证上的贡献取决于它们与网络和嵌入资源的联系,以及密集和互惠的关系为创造回报的要素这一观点的有效性。1997年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的资料首先从经验上证实,网络中的嵌入资源是社会资本的核心指标;市民参与仅

仅在跨区域的组织(不包括地方性的组织,如村、邻里和庙宇组织)中才与网络、教育和社会经济回报等测量相关,亦即市民对跨区域组织的参与才构成社会资本;而普遍信任由于没有通过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ation)和判别效度(discriminant validation)的检验,不能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测量指标。

随着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围绕着如何定义社会资本概念的相关争论日趋激烈,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研究者对此概念的内涵深感困惑。在理论建设方面,针对“社会资本”成为不同学科学者以及各种媒体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概念,张文宏(2003)指出,社会资本研究中的主要纷争是由概念界定的不统一、测量方法的差异和分析层次的不同造成的。在系统评述了布迪厄、科尔曼、波茨、普特南、博特和林南等社会学家的经典定义之后,张文宏对有关的经验研究按照个体、群体或微观、中观与宏观的分析层次进行归类。社会资本研究中的混乱与不同研究取向的学者将分析的焦点瞄准的网络位置、关系强度或嵌入性资源有关。

李继宏(2003)回顾了从格兰诺维特以来社交网络经验研究的文献,认为应用研究中的视角和方法不断变化,但是“关系”概念和强—弱关系维度却始终分析的核心。强关系假设的缺陷在于简化了社交网络和预设多元社会中并不存在的高同质群体,而弱关系的缺陷则是先验地断定存在着两个或多个没有任何交往的群体,因此建议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不对称性、互为主体性以及关系的向度和强度来对静止的、客体性的、对称的和强弱二元对立的关系概念进行“去世俗化”的建构。李继宏对于关系概念的反思是建设性的,然而这些思考如何在经验研究中转化为可以操作化的指标,进而获得实证资料的证实或证伪,需要社会学者的共同探索。其实社交网络分析从不否认关系的不对称性,如社交网络分析的当代领军人物韦尔曼(Wellman, 1988)就曾指出“内容和强度不同的关系通常是不对称地相互作用和互惠的……不对称联系和复杂网络分布在不同的稀缺资源中”。无论是有关社会支持网络

(如讨论网、朋友网和具体帮助网)的研究,还是关于职业流动和地位获得的研究,多数社交网络分析也是与具体的事件相联系的,更有一些研究具备历时性的特点。也许经验研究中的概念设计和操作化与现实社会现象存在着差别,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这些“理想类型”的作用,否则学术研究就失去了概括和抽象的意义。

边燕杰是从个体层面上研究社会资本的代表。他认为可从三种不同的角度来定义社会资本:第一,社会资本即社交网络关系,个人的社交网络关系越多,则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越大;第二,社会资本即社交网络结构,高密度的社交网络有助于约束个人遵从团体规范,而低密度的社交网络则可以减少这种约束,为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个人带来信息和控制的优势,有利于其在竞争的环境中求生和先赢;第三,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交网络资源,是个人所建立的社交网络,个人在社交网络中的位置,最终表现为借此位置所能动员和使用的社交网络中的嵌入性资源。在综合分析三种不同的社会资本定义的基础上,边燕杰指出“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本质是这种关系网络所蕴含的、在社会行动者之间可转移的资源。任何社会行动者都不能单方面拥有这种资源,必须通过关系网络发展、积累和运用这种资源”(边燕杰, 2004)。

将社会资本分为“个体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则是另外一种取向(罗家德、赵延东, 2005)。个体社会资本即外部社会资本或私人物品,除了微观的个人关系及其所蕴涵的资源外,也包括个人所占有的网络结构位置所能带来的资源。集体社会资本则指内部社会资本或公共物品,除了宏观的群体内部的社会联结与互信外,也包括促成集体行动并创造资源的群体的结构方式。

有的学者则不赞成对社会资本做过于宽泛的解释,如刘林平(2006)区分了社交网络资源与社会资本的关系。社交网络或社会资源是潜在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动用的、用来投资的社交网络;社交网络是社会资源,但是不一定就是直接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蕴含在关系网络之中,表现为通过关系网络借用资源的能力,而这种关系网

络的使用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它的成本就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构建关系网络的投入或费用,即网络中的交易费用。因此,他不同意将社会网络简单地等同于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理论一直受到功能主义观念的困扰。为了走出社会资本理论逻辑上同义反复和测量上自相矛盾的困境,有学者指出,应该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亦即从社会网络的结构而不是以其功能来定义社会资本。嵌入于个体、组织或地区中的社会网络的结构,是判断个体从社会网络获取各种回报的可能性的统一尺度。这些网络结构虽然可能带有某种功能,但社会网络的功能并不是社会资本本身,而是社会资本使用后的结果,或者说是社会网络结构的使用所得到的回报。为了彻底摒弃功能主义的局限,应该区分社会资本的结构、使用和功能这三个相关的要素。所有网络结构对旨在获得任何一种功能回报的行動的成功都具有直接的、间接的或潜在的作用。从结构视角定义社会资本有助于找到社会资本中对功能没有作用甚至具有负面影响的某些结构,并且有助于研究网络结构所具有的潜在功能,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通过在网络中使用社会资本而获得行动成功的机理(朱旭峰,2006)。

从不同的层次来定义社会资本,可能是造成该领域中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产生重大分歧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也正是对于社会资本的各种迥异的界定,吸引了来自不同学科、遵循不同学术传统的社会科学家加入到这一学术社区中,由此促进了20世纪末期以来国内外社会资本研究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的繁荣,成为社会科学界特别是社会学界的一个热点领域。

正如边燕杰所指出的,“虽然存在多种定义,但社会资本的基本定位是清楚的、内涵是明确的,即社会关系网络。这可以从资本的本质特征来剖析。资本的原始状态是资源,行为者为获取收益和回报,将其投入于增值导向的努力之中。所以,判定资本的根本形式,需从资源与行为者的关系入手……社会资本是存在于行为者与行为者的联系之中的,如关系强弱、网络大小,等等”。(边燕杰,2006a)在近几年国内社会学界关于社会资本

的经验研究中,相当多的学者采用了社会网络的视角来定义和测量社会资本。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因为只有从社会网络角度定义和探索社会资本,才有可能使社会资本成为界定明确、可以测量的实证社会学的学术概念。

## (二) 经验研究发现

### 1. 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

职业地位获得一直是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领域的一个主流课题,国内学者沿袭格兰诺维特和林南的传统,对于不同群体的求职过程、社会和政治地位的获得过程及其职业流动进行了实证研究。

边燕杰的成名作《找回强关系》(Bian, 1997)开创了运用社会网络视角研究中国地位获得的先河。在分析计划体制下中国城市的工作分配制度时,作者区分了在求职过程中通过社会网络流动的是信息还是影响以及求职者使用的是直接还是间接关系。其主要发现是,个人网络习惯于影响那些主管工作分配的实权人物,他们将分配工作当做对关系人的一种人情回报,这种行为建立在以信任和义务为特征的强关系基础上。具体而言:(1)工作更经常地是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获得的;(2)直接和间接关系都用来获取掌管分配工作的实权人物的帮助;(3)求职者和最终帮助者通过中介者建立了间接的关系,中介者与双方均是强关系;(4)使用间接关系而非直接关系的求职者更可能获得较好的工作;(5)年长的或具有较高社会经济背景的求职者比那些年轻人或地位较低的求职者更可能运用间接关系;(6)当求职者和当权者没有关系时,或当他们仅仅有表面交往时,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他们倾向于通过与一方或双方关系都强的中介人联系起来。

边燕杰、张文宏(2001)于1999年对城市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不仅证明了强关系假设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持续效力,而且验证了体制洞假设,部分证实了市场化假设、权力继续假设和机制共存假设。在计划体制下,社会网络的作用是通过强关系影响计划分配的具体方案,使关系使用者获得符合意愿的职业。双轨制和转型时代,强关系仍然起着人情交换的作用,但它是在劳动力市场

不断扩展的条件下出现的。支持市场化假设的发现是,在职业的资格考核比较严格的条件下,流动者通过社会网络所获得的是信息,而不是人情。这一情形随着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而不断凸显,这就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信息桥的作用越凸显。但是这一结论不能推广到任何具体职业,也不能作为概括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结论。这是因为,与市场化假设相悖的权力继续假设得到更广泛的证明。市场和权力的两种机制并不是平行发展、无主无次的,天津调查的结果预示着权力继续是主线、市场化是副线,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使用社会网络的流动者主要是从关系人那里获得人情,单纯通过关系获得信息的频率并未显示出增加的趋势,网络的持续作用主要在于提供人情。此外,作为信息桥的弱关系的使用率不但没有上升,反而表现出微弱下降的势头,而作为信任和规范基础的强关系的使用频率却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而上升。这就预示着,正在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机制可能比较发达,而劳资双方的信任机制、规范机制、监督机制等存在很大的漏洞,需要人情网络或强关系来补充。边燕杰(Bian, 2002)对中国正在凸显的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流动过程中“关系”的存在及其作用提供了一种制度的解释。在他看来,正在浮现的劳动力市场充满了“体制洞”,从而使得正式渠道在求职者与未来雇主之间传递信息、建立信任和形成义务的功能失效,而体制洞为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

在劳动力市场逐步趋向规范的前提下,社会网络资源究竟是阻碍还是促进了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呢?张文宏(2006a)探讨了社会网络资源在城市职业配置中的具体作用。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较贫乏、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更可能使用社会网络资源以实现职业流动;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动者比不用者的求职效率低,但前者的目标收入却高于后者;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向是从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流向个体、集体、合资、外国独资、新经济部门或无主管上级的市场化的经济实体;社会网络资源的运用,对劳资配置的吻合程度没有显著的影响。

作为中国社会中的精英群体,干部在其职业地位获得中是否也运用社会资本呢?周玉(2006)运用两省委党校部分学员的调查资料,对此做出了肯定回答。网顶、父母的行政级别、关键关系人的行政级别、与关键关系人的熟悉程度等因素对干部的地位获得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在转型时期的干部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关系强度和关系人的地位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广泛的交往并不能增加干部职位提升的机会。社会资本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了当前干部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并行不悖的双重机制。

作为弱势群体的下岗职工又如何利用社会资本来实现其再就业的目标呢?王汉生、陈智霞(1998)的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关系在下岗职工寻求职业或其他资源的过程中发挥着提供就业信息、信誉保障、经济活动中的庇护和资金帮助等功能,关系网络是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一条主要途径。丘海雄等(1998)发现,社会关系网络在对下岗职工提供经济和社会支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支持结构已经从改革前的一元化格局转变为多元化格局。赵延东(2002)通过对武汉市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的分析,研究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作用及其变化趋势。他发现,社会资本的突出作用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尚未建立的情形下。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也在不断下降,主要体现在使用社会网络的下岗职工却获得了收入较低、声望较差的工作,这可能与该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总量贫乏,且多集中于亲属、朋友的狭隘范围有关。总之,社会资本在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中的效用受到制度背景的制约。赵延东(2003)还利用同一数据分析了社会网络对于求职者的保留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影响。他发现,如果下岗职工的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比例越高,那么其在求职时的保留工资越高;网络规模效应和网络资源效应两个假设没有通过数据的检验,即下岗职工的社会网络规模和网络中所蕴涵的资源状况对保留工资没有显著的影响。个人社会网络对保留工资的影响将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日臻完善

而逐步减弱。网络构成中的弱关系对于实际工资的直接影响是负向的,网络资源对于实际工资的影响则是正向的,这也许预示着下岗职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不能获得强有力的实质帮助。赵延东(2006)还发现,下岗职工寻求再就业时大量地使用了以强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资本。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中获得工作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使用的关系人的社会地位,亦即关系人所能提供的社会资源,拥有更高地位的关系人就意味着下岗职工更可能找到较“好”的工作。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对林南的社会资源命题和边燕杰的“强关系的力量”命题提供了新的佐证。应该指出的是,赵延东将亲属以外的朋友和熟人都归为“弱关系”,似乎有值得商榷的余地。如果不能像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73)那样按照互动频率、熟识程度、信任程度和互惠程度来测量关系的强弱,而是把朋友不加区别地视为弱关系似乎不太严格。

农民工的职业职位获得和社会网络重构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课题。李培林(1996)对流动农民工的调查发现,76.1%的招工信息来源于亲友、同乡和朋友,进城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有75%是通过亲友和同乡得到的。渠敬东(2002)试图运用新经济社会学的网络分析范式,从关系强度的角度来考察农民工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他认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是围绕着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关系构成的,其中信任是这一网络的基础和枢纽。同时他也发现了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市生活的两个基本阶段:在生存阶段,围绕着强关系结成的社会网络为跨情境流动中的行动个体提供了保护伞,成为农民工在城市立足的基本条件,农民工的社会行动及其意义脉络都是依照这种以初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组建的,具有实质理性的意涵;在发展阶段中,农民工除了利用现有的同质关系外,还必须充分利用具有异质成分和制度因素的弱关系,寻求在城市生活中发展的信息、机遇和资源。正是在上述建构自身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在社会行动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由此建立了目的和动机相统一的完全的行动架构。曹子玮(2002)的研究发现,农民工主要通过

社会网中的强关系来找工作,农民工社会支持网主要是初级关系,其社会关系的作用大于社会组织。这表明,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工的社会角色、空间位置、资源获取方式虽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他们社会关系结构中的基础——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初级关系——仍然没有改变。

另外一些学者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某个特定社区的外来人口群体中的社会网络进行了深入考察。王春光(2000)通过对聚居在巴黎和北京的温州人的长期观察发现,社会网络不仅是温州人传递流动信息的媒介,而且是其流动得以实现的重要机制。社会网络成为移居外地的温州人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本:他们依赖族人和同辈,建立起自己的社会网络,为进入移居地以及以后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族亲、朋友和乡邻成为温州人社会网络的重要来源,为他们流动和迁移、就业和融资以及情感沟通提供了支持。移居以后的温州人在建构和使用社会网络方面发生了适应当地社会和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亲属关系的范围有所扩展和社会网络的地域覆盖面极大地拓宽。

通过对深圳“平江村”的实地观察和深入访谈,刘林平(2001)研究了关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理性运用逻辑。他从动态、多维、相互联系与竞争的视角,将关系分为强、弱、弱强和强强四种类型,并通过对资本筹集、寻找货源和事故处理等个案的研究发现,关系的功效是在比较中存在的,是人们获得利益、配置稀缺资源的重要手段。关系的本质是利益的交换。关系发生作用的场景是竞争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和规则不完善。寻找关系的路径是一个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扩展过程。

翟学伟(2003)认为,简单地套用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命题来解释中国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求职是不恰当的,为此,他提出用“信任”来解释中国农民工获得流动信息的可靠性问题。他把信任分为强和弱两类,具有义务性较强、熟悉度较高而且同属于一个内群体的信任是强信任,否则就是弱信任。通过对广东和浙江城市农民工的个案访谈,他发现只有强信任关系才能保证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弱信任导致独立自由的个体在不同群体

之间实现垂直或横向流动,而强信任会导致大批同质性群体流动到一地。这一访谈结果为未来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与社会网络的定量研究提供了某些启示。

无论是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还是边燕杰的强关系命题,在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员工求职过程的影响时,仅仅涉及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面,因此,将雇主引入对劳动力供求市场的分析,不仅可以了解到雇主招聘员工的方法,而且可以透视雇主做出雇用决定背后的真实原因。对雇主招聘员工的途径及原因的个案访谈结果显示,雇主在招聘员工的过程中不仅同时运用了强关系、弱关系和市场三种不同的渠道,而且偏向以特定的渠道聘任不同职位的员工。在招聘高级职位员工的过程中,通过与求职者的强关系形成信任基础,并以此作为预测员工日后工作能力与操守的依据。利用与求职者的弱关系,能使求职信息在私人网络中快速传播,从而更有效地寻找专业技术人员,增加员工与职位之间的适配性。而市场信息与职业中介机构,不但为雇主提供充足而快捷的劳动力供应,并对中高层职位员工的聘请发挥了间接的作用。针对不同职位的内在要求而采用不同的招聘途径,从而形成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廖文伟、王丽云,2005)。

## 2. 不同阶层的社交网络与社会资本

阶层分析和网络分析是研究社会结构的两种不同范式和视角。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学者们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边燕杰(2004)分析了不同阶层的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差异。按照网络规模、网顶、网差和网络构成等指标来测量,行政领导、经理和专业技术阶层的社会资本总量高于非技术工人,其次是办事人员和技术工人,最低的是雇主、自雇者和非技术工人。前三个阶层拥有相对优势的社交网络。行政领导阶层的网络规模以及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纽带关系均明显高于非技术工人阶层。相反,雇主和自雇阶层则缺乏网络优势,虽然他们的网络规模大于非技术工人,但其网顶低、网差小,尤其缺乏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纽带联系。其研究结果还揭示出,被访者的科层关联度越高,其社会资本总量越

丰富,表现为拜年网规模较大、网顶较高、网差较大,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联系也较多;被访者的市场关联度越高,其社会资本总量越高,社交网络优势越明显。尽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索社会资本的差异,但是阶级阶层地位和与职业相关的社交关联度,是两个不同忽视的视角。阶级阶层地位限制了人们自由地拓展社交网络、积累社会资本。职业活动给人们提供了不同的社交机遇。阶级阶层地位优势以及工作场域中的职业交往优势,可以转换为社交网络和社会资本的优势。一旦具有了社会资本优势,将会产生主客观的积极效应。

边燕杰等(2005)运用城市不同家庭之间互相拜年的资料,评估了不同阶层内部和之间的关系强度和多元性,测量了阶层位置之间的社交距离。他的研究发现是:第一,体力工人家庭的社交交往更可能局限在阶层内部,他们在社交上处在边缘和孤立的状态;第二,官僚精英也呈现出独特的阶层内交往特征,意味着尽管干部阶层仍然占据着资源和机会分配的中心位置,但是在与不同职业阶层建立联系方面并不占据核心位置;第三,在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之间,存在着一种若即若离的交往模式,说明在收入相似的群体和个人之间,管理权力发挥着阶层隔离的作用。总之,无论是哪个阶层的家庭和个人,都倾向于同本阶层的人互相拜年,这是社交交往中的一个主要倾向。但是,也同时存在着“职业阶层相互隔离”、“阶层间互相渗透”及“阶层间梯次交往”三种倾向。正如作者自己总结的那样,由于样本有限,这个研究结论只是初步的和探索性的。未来运用全国城市调查资料是否能够发现相同的网络模式,如何超越“春节拜年网”的方法技术评估和比较阶层地位的影响作用,运用关系范式探讨阶层结构是否还需要分析每一阶层的产权差别,这些问题需要未来的经验研究来回答。

张文宏等(2004)运用城市居民社交网络调查的实证资料,分析了阶层地位对于城市居民社交网络构成的影响:各阶层在选择讨论网成员时群内选择或自我选择倾向非常明显,阶层地位邻近、社交距离较小的人们成为讨论网成员的可能



性较大,处于阶层结构顶端和底端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和工人的阶层异质性指数较低,位于中间阶层的小雇主和普通白领的阶层异质性指数较高,普通白领的阶层异质性指数明显高于工人。同工人阶层相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群内选择倾向更明显,小雇主的阶层趋同性指数最低。这个结果表明,在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成员的选择过程中,发挥中心作用的机制主要是同质性原理,声望原则或“上攀效应”仅仅表现在小雇主阶层中。与此相一致,阶层内部的选择是中国城市居民构建和维持社会网络的主要倾向。社会网络成员选择过程中的阶层界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障碍,小雇主与其他阶层的社会渗透性较强。张文宏(2005a)运用同一资料探讨了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阶层差异。统计结果表明,阶层地位对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网络规模大于工人阶层,前者的关系种类比后者更多元化。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比工人阶层拥有更明显的“结构洞”社会资本,前两个阶层与网络成员的交往频率低于后者。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社会网络在性别、年龄和职业异质性方面高于工人阶层。总之,占据更高阶层位置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比工人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本。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工人阶层之间,可能与中国阶层结构的不充分分化有关。此外,张文宏(2005b)还探讨了阶层地位对于社会网络性质的影响。作者将讨论的问题分为情感性、工具性和混合性三种。重要的发现有两点:第一,同工人阶层相比,专业

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与其网络成员更可能讨论混合性问题而非单纯的情感性问题;第二,专业行政管理阶层与网络成员更可能讨论工具性问题,工人阶层更可能讨论单纯的情感性问题。

还有学者从结构主义视角中对中国政策精英群体的网络整体结构和网络阶层结构进行了分析。调查发现,决定政策精英网络规模的因素有网络投资、知识运用能力、职业流动体制稳定性和行政级别。具体表现为,政策精英投入于社会交往的时间越多,其社会网络规模越大。高学历和海外留学经历在结识更高级别行政官员时的“敲门砖”作用越来越明显。行政级别在政策精英认识高级官员起到比结识普通官员更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与社会不同阶层人群交往时存在着“准入门槛”的差异,作为身份标识的学历、海外经历、行政级别随着网络成员级别的提高,对政策精英社会资本的作用会变得越来越大。相反,作为反映人际交往能力的职业流动体制稳定性和个人交往投入的贡献,则会随着网络成员级别的提高而逐渐减弱。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该研究对“职业流动能够促进社会资本”的“常识”提出了质疑。这一意外发现促使社会资本的研究者必须重新审视以往关于职业流动和社会资本之间关系的若干命题,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可以扩展的一定空间(朱旭峰,2006)。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张文宏,1963年生,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丁惠平)